

伊沙战略对峙、美以沙三角与 中东格局的未来平衡*

赵建明

[内容提要] 伊朗同沙特的战略对峙是当前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变化,也是伊沙两国时隔近30年后的再次对峙。伊沙间的结构性矛盾是造成两国对峙的潜在根源,美国的政策收放是激化伊沙对峙的催化剂。主张战略收缩和接触伊朗的奥巴马主义直接激化了沙伊矛盾,让沙特走上同伊朗开展全方位竞争的道路。特朗普上台后奉行“反伊挺以和沙”的政策,深刻改变了伊沙对峙和对抗的游戏规则,并形成了美以沙三国联手打压伊朗的态势。此外,特朗普重返中东有着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打击敌人、整固同盟、民主改造、地区治理就成了特朗普“四部曲式”的任务序列,最终目的是实现在美国主导下中东格局的再平衡。

[关键词] 伊朗 沙特 伊朗核问题 特朗普中东政策 中东地缘政治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18)06-0157-10

DOI:10.16502/j.cnki.11-3404/d.2018.06.022

当前,伊朗与沙特的战略对峙已经成为中东继“阿拉伯之春”、打击“伊斯兰国”之后的重大事件。2016年两国断交并大打出手,是1988年伊沙断交事件后两国之间发生的另一起恶性事件。时隔近30年后伊沙两国为何再度走向对抗?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伊朗和沙特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及美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来寻找原因。

一、伊沙对峙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

伊朗和沙特的对峙并非由来已久,伊沙两国的关系在20世纪50—70年代相当融洽,两国都同美国结盟并成为尼克松时期美国在中东和海湾地区的支柱国家。但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霍梅

尼在伊朗建立了伊斯兰政府,伊沙两国的内政外交出现严重分歧,伊沙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开始浮现。两国的结构性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两国的制度差异。二战后,海湾地区的主导政治形态是君主体制。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否认君主合法性的政治话语激化了伊朗同沙特等海湾地区君主制国家的矛盾。霍

* 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伊斯兰使命、撒旦话语与革命后伊朗的外交安全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4BGJ037)、2017年度上海浦江人才计划“派系政治与后伊核时代伊朗的外交政策变化”(项目编号:17PJ078)的阶段性成果。

梅尼认为,从现实上讲,君主政体是世界上所有政治形态中最腐败、最荒淫的政体,所有君主都是社会的寄生虫,他们荒淫无耻,挥霍无度,作威作福,欺压民众;从宗教上讲,伊斯兰与君主制水火不容,这可以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时代,当时埃及苏丹、麦加国王都反伊斯兰,拒绝先知穆罕默德在这些王国传播伊斯兰教。^①从个人经历上看,霍梅尼曾被伊朗的巴列维国王驱逐流放,因而对巴列维国王所代表的君主体制恨之入骨。^②此外,霍梅尼的伊斯兰共和国是在推翻巴列维王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要承认共和国的合法性就必须否定前朝,巴列维王国越腐败,共和国就越具有合法性。

第二,两国的教缘冲突和教派冲突。从教缘冲突上看,伊朗是什叶派大国,国内什叶派信众近6500万,占比约90%—95%;沙特是逊尼派大国,信众近2500万,占比约85%—90%。加之地理上临近,更增加了这两个教派大国之间冲突的可能性。沙特镇压国内什叶派的政策经常受到伊朗的指责,而沙特则认为此举干涉其内政。

从教派上看,除了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差异之外,伊沙之间的教派差异还体现在伊朗信奉12伊玛目教派,而沙特信奉瓦哈比教派。^③在信仰上,伊朗的12伊玛目教派除了崇拜真主和先知,还信奉以阿里、侯赛因等12位宗教领袖伊玛目。瓦哈比教派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内志地区,由谢赫穆罕默德·瓦哈比创建。瓦哈比教派发端于塞百罕教派,以极度仇视什叶派和苏菲派著称。瓦哈比教派自诩为逊尼派和伊斯兰教的正统,瓦哈比本意有清洁和正本清源之意。瓦哈比主张无论伊斯兰教法还是生活习俗都要回到先知穆罕默德时代,回归《古兰经》和圣训的正统,严格遵循“万物有主唯有真主”,反对任何自然崇拜和诸神崇拜等。瓦哈比极度仇视什叶教派和苏菲派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这些教派离经叛道,是利用圣人或导师崇拜来取代对真主安拉的崇拜。为此,瓦哈比大肆焚毁什叶派在沙特境内的四座什叶派伊玛目圣陵(第二伊玛目哈桑·阿里、第四伊玛目阿里·侯赛因、第五伊玛目穆罕默德·阿里、第六伊玛目贾法尔·穆罕穆德)。此外,沙特还对什叶派信众特别看重的“侯赛因殉难朝圣”表示谴责。^④

第三,伊朗法基赫治国与沙特瓦哈比治国之

间的冲突。伊朗的政教结合表现为法基赫治国(Velayat-e Faqih, Guardianship of the Islamic Jurists, 即宗教法理学家治国)。霍梅尼认为,伊朗的法基赫治国体制是唯一被伊斯兰教法认可的合法政体,只有宗教法理学家治国才能让伊斯兰教法得以遵循。因为宗教法理学家在合法性上来自真主安拉、先知穆罕默德以及12伊玛目之间的传承。在伊玛目伟大隐遁之后和末日审判来临之前,(伊斯兰)世界应当由宗教法理学家来统治,其他任何形式都是非法的,只有法基赫治国才符合伊斯兰的利益。霍梅尼认为,沙特的瓦哈比教士是世俗权力的奴隶。^⑤另外,霍梅尼、拉夫桑贾尼、哈梅内伊坚决否认沙特王室对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圣城的管理权,认为沙特不能凭借地理之便就天然地成为伊斯兰两大圣城的护持国。两大圣城是世界穆斯林的圣城,应当由国际穆斯林共同

① Ruhollah Khomeini, *Imam's Final Discourse: The Text of th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Testament of the Leader of the Islamic Revolution and the Founder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Imam Khomeini, Tehran: Iranian Ministry of Guidance and Islamic Culture, 1992, pp. 37-49.

② 关于霍梅尼和巴列维的个人恩怨,参见 Eddie Stone, *Khomeini: The Shah, the Ayatollah, the Shiite Explosion*, Los Angeles: Holloway House, 1980, pp. 37-170.

③ 什叶派具体还可细分为12伊玛目教派、7伊玛目等教派。伊朗的12伊玛目教派主张世袭原则,认为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女婿和来自哈希姆家族(圣族)的阿里及其直系后裔才是合法继承人,否认阿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前三任哈里发的合法性,只承认四大哈里发中的阿里的合法性。什叶派领袖被尊奉为伊玛目。什叶派人口占比约10%—15%,因此也被称为“少数派”。逊尼派主张推选制,认为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者应由穆斯林社团根据资历、威望选举产生,并认为穆罕默德的门徒、由穆斯林社团推选的四大哈里发是合法继承人。逊尼派占比为85%—90%,也被称为“多数派”。参见金宜久《伊斯兰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④ 在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改善同伊朗的关系,容许伊朗和其他国家的什叶派信众朝圣。伊拉克有六处伊玛目圣陵,尤其著名的是纳杰夫的第一伊玛目阿里圣陵和卡尔巴拉的第三伊玛目侯赛因圣陵。2017年的圣陵朝圣盛况空前,人数规模超过麦加朝觐。伊朗有200万,世界其他各地有1380万什叶派信众赴伊拉克的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朝圣。参见 Scott Peterson, "Why Shiite Pilgrimage to Karbala Had Special Meaning This Year", in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ember 14, 2017, see from <https://www.csmonitor.com/World/Middle-East/2017/1114/Why-Shiite-pilgrimage-to-Karbala-had-special-meaning-this-year>.

⑤ Ruhollah Khomeini, *Islam and Revolution: Writings and Declarations*, London: Mizan Press, 1981, pp. 140-146.

管理而不能由沙特王室垄断。^① 2016年伊沙断交后,伊朗的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再度呼吁重新考虑沙特对伊斯兰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管理权。^②

沙特的政教结合表现为两点:一是沙特王权与瓦哈比教派结成政治同盟。这种结盟可追溯到沙特第一帝国时期,当时沙特王室的穆罕默德·沙特同谢赫穆罕默德·瓦哈比达成政治契约:瓦哈比承诺宗教从属于王权,王权承诺王国内只容许瓦哈比传播,瓦哈比负责掌管王国内的宗教意识形态和社会习俗。这种同盟对王室来讲,使王权的合法性得到了宗教人士的加持,王国也因推崇瓦哈比教派而独树一帜;对瓦哈比来讲,备受排挤的瓦哈比可以依托王权进行宗教扩张,沙特家族特别是伊本沙特的开疆拓土扩大了瓦哈比的传播。二是沙特国王自封为伊斯兰教两大圣城的护持者。伊斯兰教两大圣城麦加和麦地那位于沙特境内,凭借地理优势,沙特国王从1986年开始自封为“伊斯兰两大圣城的护持者”^③,并对任何质疑沙特作为伊斯兰教领袖的国家或个人表示强烈反对,比如伊朗的霍梅尼和利比亚的卡扎菲^④。因此政教关系让伊沙两国水火不容。

第四,对美外交上的冲突。沙特是中东较早同美国结盟的国家,美沙同盟最早可追溯到1945年沙特国王伊本·沙特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达成的“石油换安全”秘密条约,核心内容是沙特承诺向美国提供稳定的石油供给,而美国则承诺向沙特提供驻军、军援等安全保障。^⑤ 在经历了伊斯兰革命、苏联侵略阿富汗、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以及激进伊斯兰人士占领麦加禁寺等事件之后,沙特已经将美国视为其维系政权和抵御外敌的支柱,特别是抵御近邻伊朗和伊拉克的军事威胁的支柱。不仅如此,沙特还通过军购和高层互访拉近同美国的关系。沙特“石油换武器”的做法被视为向美国缴纳的安全税。

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奉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对外政策,并认为美国是“大撒旦”和“伊斯兰的敌人”,认为伊斯兰在近现代所遭遇的挫折和失败都源于西方殖民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入侵。霍梅尼认为,美国策动1953年政变后成为国王巴列维的主子,巴列维不过是美国的傀儡和走狗。巴列维卖国求荣,通过出卖伊朗的主权和利益来换取美国对巴列维

政权的支持;而美国完全纵容巴列维对伊朗民众的剥削和压迫,因此,革命后的伊朗必须反对美国。^⑥ 在地区问题上,伊朗认为海湾和中东地区各种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美国的干涉,主张地区事务由地区国家主导,且强烈反对沙特等国同美结盟,认为任何同美结盟的国家都是美国的“仆从国”。

第五,两国的地区主导权之争。两国的地区主导权之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沙特为主导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合会”)对抗什叶派联盟。在外交上,沙特长期奉行以海湾为内环、以阿拉伯为中环、以伊斯兰

① 拉夫桑贾尼在1987年11月伊朗举行的“保护清真禁寺的纯洁与安全国际会议”上呼吁,将麦加从沙特王室解放出来,让麦加和麦地那成为自由城市并交由“伊斯兰国际”(Islamic International)管理。参见 <http://martinkramer.org/sandbox/reader/archives/khomeinis-messengers-in-mecca/>。蒙特扎尼也斥责沙特是“来自内部的英国代理人”,对真主或真主的客人朝圣者没有丝毫的尊敬,就像耶路撒冷应当从以色列解放一样,麦加和麦地那也应当从沙特王室解放出来。参见 <http://martinkramer.org/sandbox/reader/archives/khomeinis-messengers-in-mecca/>。

② “Khamenei: Muslims Should Reconsider Letting Saudis Run Mecca Pilgrimage”, in *The Jerusalem Post*, September 5, 2016, see from <https://www.jpost.com/Middle-East/Khamenei-Muslims-should-reconsider-letting-Saudis-run-Mecca-pilgrimage-466912>.

③ 两大圣城或圣寺的“护持者”具有特定的宗教含义。1514年,萨拉丁最早使用“护持者”这一称号,之后从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萨利姆一世到穆罕默德六世都使用这一封号。参见 Galal Fakkar “Story Behind the King’s Title”, in *Arab News*, January 27, 2015, see from <http://www.arabnews.com/saudi-arabia/news/695351>。

④ 利比亚前总统卡扎菲表示,应当在麦加和麦地那成立“伊斯兰梵蒂冈”(Islamic Vatican),用以管理全球穆斯林的圣伊斯兰圣城。参见 David B. Ottaway “Saudis Sever Tie With Libya, Cite Qaddafi Attacks”, in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9, 1980, see from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1980/10/29/saudis-sever-tie-with-libya-cite-qaddafi-attacks/1e659674-9cc2-48e8-9f8d-136a046a7c11/?noredirect=on&utm_term=.99c7b65c1425。

⑤ 关于美沙之间的“石油换安全”关系,参见 Aeron D. Miller, *Search for Security: Saudi Arabian Oil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9-1949*,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0。

⑥ See James A. Bill, *The Eagle and the Lion: The Tragedy of American-Iranian Rela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Gary Sick, *All Fall Down: America’s Tragic Encounter with Iran*, New York: Random, 1985。

世界为外环的“三环稳定政策”^①,并凭借自身在海合会的地位和美沙同盟来谋求在海湾和中东地区的主导权。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以什叶派为纽带,持续在叙利亚、黎巴嫩、巴林、也门、伊拉克等什叶派国家扩大影响力,并构建了什叶派联盟,以对抗由沙特主导的海合会。二是常规军备竞争。沙特致力于在常规军备上全面超越伊朗,其战斗机、主战坦克等硬件装备远超伊朗,每年数百亿美元军购合同既是维系美沙同盟的纽带,也是沙特为超越伊朗而被迫承担的代价。财力稍逊的伊朗则谋求错位发展,集中发展导弹、常备军及实现武器国产化,是中东极少数军工体系相对完备的国家。三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竞争。当前,巴勒斯坦问题已经成为中东大国抢占意识形态高地和话语权的重要议题,伊朗提出的“以色列是小撒旦”“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等言辞与沙特提出的“阿拉伯和平倡议”均具有倾轧对手、争夺话语权的意味。^②

二、奥巴马主义、中东地缘政治变化与伊沙对峙

两伊战争失利和霍梅尼去世终结了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输出。之后,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奉行同海湾国家改善关系的缓和战略,伊沙两国的结构性矛盾因两国关系的改善而暂时得到缓解。但随着中东地缘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伊朗核问题的出现和奥巴马主义的盛行,两国既有的结构性矛盾再度被激活。2016年,沙特处死国内什叶派教士引发了伊朗民众冲击沙特使馆和伊沙断交等连锁事件,伊沙矛盾陡然升级,两国再度走向对峙。

第一,奥巴马的战略收缩导致伊沙对峙。美国作为格局主导国,在经济制裁、外交遏制、安全防范等方面冲在最前面,沙特、以色列等国则搭乘美国的安全便车,享受美国带来的安全红利。2013年,伊朗总统鲁哈尼就任后奉行对美“建设性互动”政策,以核问题的解决推动美伊关系的缓和。2015年7月,伊朗和包括美国在内的伊核问题六国达成了历史性的《有关伊朗核问题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以下简称“核协定”)。在奥巴马之前,美国、沙特、以色列等国将伊朗视为共同的敌人,但当奥巴马选择改善同伊朗关系之时,伊朗

从美国的宿敌变为可接触的国家,打击伊朗不再是美沙以等国的共同目标。但同时,沙特却因伊沙结构性矛盾和核问题的不断升级而视伊朗为最大的威胁,美沙两国逆向调整政策导致沙特只能独自面对伊朗的威胁。自2013年美伊磋商有关核问题的“中期协定”以来,沙特的外交风格大变,开始积极干涉地区事务。2016年,沙特更因“教士事件”而断然同伊朗断交。

第二,伊朗核问题引发伊沙矛盾和对峙。2002年被曝光的伊朗核问题让沙特大为震惊。如果伊朗的核进程纯粹是为和平利用核能,那么伊朗将率先成为海湾核工业体系相对完整的国家。如果伊朗的核进程是为发展核武器,那么一旦伊朗成功拥核,核武器所具有的杀伤力和战略威慑力将让沙特的常规军备优势荡然无存。更让沙特难以容忍的是,在解决这一将危及沙特国家和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大事务时,沙特始终被排斥在外。当哈塔米同欧盟三国谈判时,沙特警告哈塔米是“蒙骗西方的骗子”;当内贾德顶着压力推进核进程时,沙特怂恿美国“摧毁伊朗核设施”^③;当鲁哈尼推行和解外交时,沙特强烈反对奥巴马同伊朗和解。当但美国不为沙特所动而选择签署核协定时,沙特愤然表示一旦伊朗拥核,沙特将从巴基斯坦购买核武器。^④ 沙特因受孤立冷

①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see from <http://www.mofa.gov.sa/sites/mofaen/aboutKingDom/KingdomForeignPolicy/Pages/KingdomPolicy34645.aspx>.

② “阿拉伯倡议”是2002年贝鲁特阿盟峰会上由沙特前国王阿卜杜拉提出的。倡议认为,为实现阿以和平,以色列必须从1967年战争中占据的领土撤军,包括戈兰高地、南黎巴嫩等,并遵照联合国第194号决议解决巴勒斯坦难民回归问题,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成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为此,阿拉伯国家将考虑结束同以色列的冲突,签署和平协定,同以色列在综合性和平的基础上建立正常关系。参见“Text of the Beirut Declaration”, March 28, 2002, see from http://news.bbc.co.uk/2/hi/world/monitoring/media_reports/1899395.stm.

③ “US Embassy Cables: Saudi King Urges US Strike on Iran”, in *The Guardian*, April 20, 2008, see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us-embassy-cables-documents/150519>.

④ Alexander Sehmer, “Saudi Arabia ‘Could Buy Pakistani Nuclear Weapon’”, in *The Independent*, May 18, 2015, see from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middle-east/saudi-arabia-plans-to-buy-pakistani-nuclear-weapon-10257964.html>.

落而愤怒失望的情感可见一斑。

第三,阿拉伯阵营的内部巨变刺激了伊沙矛盾的激化。从伊拉克战争到“阿拉伯之春”,阿拉伯阵营内部局势陷入了混乱和动荡,反美和亲伊力量衰微,从而刺激了沙特的“野心”。从穆巴拉克倒台到穆兄会的穆尔西政府再到塞西政府,埃及的国内政治非但没有实现政治民主化,反而重新回到强人政治的起点,政权更迭和革命混乱带给埃及的是政治上的专制、经济上的迟滞和社会上的动荡。在激进的反美阵营中,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和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先后被推翻,叙利亚的巴沙尔政府岌岌可危,反美势力衰微。亲伊朗的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政局目前仍动荡不定。伊拉克在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冲击下国之不国,貌合神离的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让伊拉克的未来重建举步维艰。真主党一直被视为伊朗干涉黎巴嫩内政的触手,但黎巴嫩政局因总理哈里里滞留沙特而陷入动荡。^① 这些动荡和变局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沙特的“野心”,它只要凭借财力拉拢没落的埃及和战乱国家,并把染指阿拉伯世界的伊朗推出去,那么沙特就有可能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新盟主,这也是沙特极力介入巴林、也门、叙利亚局势的内在动因。沙特同伊朗的争夺兼具拉拢阿拉伯国家和打击伊朗的双重目的。

第四,萨勒曼主义的国内意义导致伊沙对峙。萨勒曼就任国王后,沙特开始积极参加针对伊朗的热战和代理人战争,哪里有伊朗的支持哪里就有沙特的反对。沙特改变外交风格与中东的地缘政治变化有关,更与萨勒曼父子欲创建萨勒曼王朝有关,废储和反腐事件凸显了萨勒曼国王的传嫡意图。实际上,“沙特愿景 2030”^②和对外战争就是要为王储穆罕默德树威立信,积累继承王位的政治资本。沙特对伊朗的战争越成功,王储穆罕默德的声望就越显赫,登基就显得越理直气壮,因此,打败伊朗成为让王储顺利登基的加冕礼。伊沙对峙也成为服务沙特内政的重要因素。

在上述因素驱使下,伊朗成了沙特最大的安全威胁和成就阿拉伯盟主道路上必须跨越的障碍,为此,沙特同伊朗开展全方位竞争。

第一,沙特围堵伊朗,压缩后者的外交空间。首先,为对付伊朗,沙特开展“金元外交”,构建以索马里和苏丹为主的东非北非反伊同盟。索马

里、苏丹、吉布提、厄立特里亚、摩洛哥成为沙特竞相拉拢的国家,东非北非成为沙特着力打造的战略纵深。2016年1月沙伊断交后,苏丹、索马里、吉布提、摩洛哥先后同伊朗断交,并积极参与沙特领导的也门战争。其次,通过经济援助、筹措红海大桥等拉拢埃及。2013年在穆兄会的穆尔西政府被塞西将军推翻后,仇视穆兄会的沙特等国为拉拢埃及并让埃及远离伊朗,海合会国家于2013年为埃及提供了120亿美元援助。^③ 此后,沙特连续向埃及提供了数百亿美元援助。^④ 巨额援助让埃及在反恐等问题上注重同沙特协调立场。再次,中东地区组织成为沙特遏制伊朗的平台。沙特在海合会中拥有绝对的发言权,当前,阿拉伯国家联盟(以下简称“阿盟”)海合会化和沙特化的特征日益明显,政治强人穆巴拉克、萨达姆、卡扎菲的离场让阿盟成为海湾国家的阿盟,阿盟在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和平进程、开除卡塔尔出盟等问题上更多地反映了海合会或沙特的意志。

第二,沙特极力争夺伊朗势力范围中的每个国家。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构建起以德黑兰为中心,以伊叙联盟为依托,包括巴林、也门、黎巴嫩在内的什叶派势力范围。在伊沙对峙的背景之下,巴林、叙利亚、也门、黎巴嫩四国成为沙特极力争取和打击伊朗的主要目标。2011年2月,巴林发生示威后,沙特火速出兵帮助平息示威;2011年4

① “Hariri: What Happened in Saudi Stays in Saud”, November 28, 2017, see from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7/11/hariri-happened-saudi-stays-saudi-171128062831431.html>.

② “Saudi Vision 2030”, see from <http://vision2030.gov.sa/en>.

③ 120亿美元一揽子援助计划包括:沙特将提供50亿美元贷款(20亿美元直接存款、10亿美元现金、20亿美元价值的石油),科威特提供40亿美元现金和石油,阿联酋提供10亿美元赠款和20亿美元无息贷款。参见 Jeremy Ravinsky, “Friends Again? Saudi Arabia, UAE Jump in to Aid Egypt”, in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y 10, 2013, see from <https://www.csmonitor.com/World/Global-Issues/2013/0710/Friends-again-Saudi-Arabia-UAE-jump-in-to-aid-Egypt>.

④ 2015年,沙特承诺未来五年为埃及另外提供80亿美元援助;2016年,沙特国王萨勒曼访问埃及时表示将为埃及提供160亿美元投资,发展西奈半岛和修建红海大桥。参见 Omar Mawji “Saudi Arabia Comes to the Rescue of the Egyptian Economy”, in *Geo-political Monitor*, April 25, 2016, see from <https://www.geopoliticalmonitor.com/saudi-arabia-comes-to-the-rescue-of-the-egyptian-economy/>.

月叙利亚发生内战后,沙特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发动针对伊朗和巴沙尔政府的代理人战争;2015年4月,沙特集结九国联军发动了对也门的战争,联军中的埃及、摩洛哥、约旦、吉布提、厄立特里亚等多是接受沙特经济援助的国家;2017年11月,沙特滞留黎巴嫩总理哈里里,并借此来打击甚至清除伊朗在黎巴嫩的真主党势力。

第三,代理人战争和低烈度冲突成为沙特压制伊朗的主要手段。2011年叙利亚爆发内战后,沙特资助政府反对派同巴沙尔政府展开代理人战争。2015年,沙特纠集九国联军打击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组织,亲沙特的也门雇佣军被整合为萨勒曼意志旅(Salman Decisiveness Brigades),也门总统哈迪长期居住在沙特首都利雅得。

第四,沙特与以色列走向合流。因为犹太建国和巴以冲突,以色列成为包括沙特在内的所有穆斯林的敌人,但共同盟友美国 and 共同敌人伊朗让沙以合流成为可能。沙以两国都反对伊朗发展核武器并视其为心腹大患,伊朗同哈马斯、真主党、胡塞组织的联系让沙以两国如鲠在喉,这也让沙以两国站在反对伊朗的同一战线。沙特相信以色列能够凭借军事打击能力和对美影响力在伊朗问题上“创造奇迹”^①。美国驻以大使理查德·琼斯(Richard Jones)披露,沙特和以色列早在2005年就开始接触了。^②2015年5月,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披露,从2014年初开始,沙以两国17个月内在印度、意大利、捷克进行了五次秘密会议,磋商对付共同的敌人伊朗。^③2013年11月,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沙特同意为打击伊朗核设施的以色列攻击编队提供领空过境权。^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法国费加罗报》表示,“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在伊朗及其核问题上立场一致,伊朗不该被容许发展核武器。”^⑤2018年,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出访美国时会见了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犹太人北美联合会(The Jewish Federations of North America)等著名犹太组织代表。^⑥鉴于美国犹太组织的政治属性和民族特性以及他们在美以两国的影响力,沙特王储的会见意义不言而喻。此外,以色列和

沙特官员对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游说几乎是“背靠背游说”(back to back lobby),且都是敦促美国遏制伊朗、让俄罗斯远离伊朗的说辞。^⑦

伊沙两国相互角力的结果是在海湾和中东地区形成了伊沙对峙集团。出于地缘政治、教缘政治、历史因素的考量,所有海湾国家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被裹挟其中,且都被迫选边站队,否则就会受到排挤,卡塔尔就是例证。在两大集团的力量对比上,尽管沙特拉拢了众多同盟国家,但这些国家各怀心事。而且沙特和以色列的合流大多是在幕后操作,公开关系将让沙特承担巨大的道义代价和外交风险,而且时局远未紧迫到足以让以色列为沙特出头的地步。对伊朗来讲,沙特背后的美国和以色列让它投鼠忌器,不敢轻举妄动。因此,伊沙对峙势均力敌,两国暂时处于战略胶着状态。

- ① “Israel’s Relations with the Gulf States Focus on Iran, Perception of Israeli Influence in Washington”, March 19, 2009, see from https://wikileaks.org/plusd/cables/09TELAIVIV654_a.html.
- ② See Hana Levi Julian “Secret Talks Between Israel and Saudi Arabia”, December 21, 2006, see from <http://www.israelnationalnews.com/News/News.aspx/117864>.
- ③ Eli Lake “Israelis and Saudis Reveal Secret Talks to Thwart Iran”, June 5, 2015, see from <http://encc.bingj.com/cache.aspx?q=wikileaks+israel+saudi+strategic+alliance&d=4662326127823456&mkt=zh-CN&setlang=zh-CN&w=G9pT9KR0cnxILlMcmQcIeZ4aAS1xGK0w>.
- ④ See Anshel Pfeffer “Sunday Times Report Details Alleged IAF Strike on Sudan Arms Factory”, October 28, 2012, see from <http://www.haaretz.com/blogs/the-axis/sunday-times-report-details-alleged-iaf-strike-on-sudan-arms-factory.premium-1.472767>.
- ⑤ “Saudi Arabia Denies any Cooperation with Israel”, in *Albawaba*, November 18, 2013, <http://www.albawaba.com/news/saudi-arabia-contingency-plan-534559>.
- ⑥ Jason Ditz “Saudi Crown Prince Meets AIPAC, Other Jewish Leaders During US Visit”, March 29, 2018, see from <https://news.antiwar.com/2018/03/29/saudi-crown-prince-meets-aipac-other-jewish-leaders-during-us-visit/>.
- ⑦ See Leonid Issaev and Nikolay Kozhanov “The Russian-Saudi Rapprochement and Iran”, August 24, 2017, see from <https://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7/08/russian-saudi-rapprochement-iran-170817154056810.html>; Mark Galeotti, “Putin Is Playing a Dangerous Game in Syria”, in *The Atlantic*, February 15, 2018, see from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8/02/the-costs-of-russian-intervention-in-syria-are-rising/553367/>.

三、伊沙对峙与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政策

如果伊沙对峙和竞争仅局限于双边和地区,其波及范围和影响力将相对有限,但特朗普政府强势回归改变了伊沙对峙的游戏规则,并让既有的伊沙竞争变得更为激烈、更为残酷,甚至可能会打破当前伊沙对峙的胶着状态。

特朗普对伊朗的认知同前任奥巴马截然不同,他将伊朗视为“美国在中东的最大敌人”和“所有麻烦的制造者”。在他看来,从1980年的“使馆人质事件”到1996年美国驻沙特兵营遇袭再到“9·11”事件,伊朗从未改变强硬反美的立场。伊朗还发展核武器,支持恐怖组织,阻碍中东和平进程,侵犯人权,奥巴马接触伊朗的政策完全是失败的,伊朗并未被塑造成“中东的建设者”。特朗普认为,核协定是“万恶之源”,伊朗暂停浓缩铀的研究只是延缓而非终止发展核武器,而因制裁解除释放的1000亿美元被伊朗用于发展核武器、资助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组织等恐怖组织,因此,特朗普强调要么重新修订、要么将其废除。^①在美国及其中东盟友看来,核协定是美国缔结的“最坏的单方协定”,使得伊朗的专制政府在政治和经济上重新恢复活力,缓解了伊朗国内的紧张局势。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新策略包括:对伊朗施加新的制裁,与盟国一道打击伊朗,破坏地区安全和支持恐怖组织的行为,防止伊朗危害邻国、自由航行和国际贸易,并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②

特朗普政府的对伊政策以废除核协定为核心,以经济制裁和在叙利亚拖住伊朗为策应。其中,废除核协定具有打击伊朗和维系同盟关系的双重功效;而对伊实行顶格制裁,目的是以压促变,希望通过严厉的经济制裁进一步恶化伊朗的投资环境和投资预期,使伊朗的外部投资和石油收入锐减。为了维持昂贵的对外战争,伊朗政府需要牺牲国内民生,这将招致伊朗民众的不满和抗议,从而使伊朗当局丧失民心并下台。在叙利亚问题上,特朗普通过展示实力来向伊朗施压。2018年4月,特朗普政府以“化学武器危机”的名义对叙发动导弹袭击,^③从而刺激沙以双方采取了进一步的军事冒险行动:以色列空袭伊朗驻叙

基地和防空设施,沙特也酝酿向叙利亚派驻作战部队。美以沙的三方行动让伊朗进退维谷:如果伊朗力保巴沙尔,则意味着伊朗要对叙利亚持续输血,伊朗在叙利亚投入时间越久、阵线拉得越长,伊朗消耗的战略资源就越多、负担也越沉重;如果伊朗放弃叙利亚,则意味着伊朗苦心经营数十年的革命遗产和地区布局将彻底崩盘。在相当程度上,在叙战争已经成为伊朗为保留革命遗产而进行的形象战争。

特朗普重新调整中东政策对伊沙对峙的意义在于:第一,恢复敌人同一性。伊朗从奥巴马时期的“可接触者”重新变为地区公敌,高举“反伊”旗帜提升了美国在盟友心目中的威望,加强了美国在盟友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第二,美以沙对伊朗的“三打一”态势将打破伊沙平衡。总统特朗普、国家安全助理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国务卿麦克·蓬佩奥(Mike Pompeo)组成的反伊组合强硬程度甚至超过了小布什政府。当前,中东地区已经呈现以美国为主帅、沙以为先锋的三国反伊集团。鉴于伊朗在经济实力、军事力量上远逊于美以沙三国的总体实力,因此,随着美国加强与沙以的战略协调,“三打一”的局面将会改变伊沙战略对峙的平衡。第三,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在中东地区实现了轻资产干涉:奥巴马的战略退缩和对伊缓和让沙、以两国承担起遏制伊朗的责任,美国则转为幕后;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仅靠将伊朗重新树立为“地区公敌”,就实现了凝聚沙特和以色列的目标。除了战术性军事打击,美国对中东地区并未投入更多的战略资源,但美国对中东事务的掌控力却显著提高,在地区干预上也更灵活自如、可进可退。

^① “Full Transcript of Trump’s Speech Withdrawing from the Iran Deal”, in *The Atlantic*, May 8, 2018, see from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8/05/full-transcript-iran-deal-trump/559892/>.

^②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on Iran Strategy”, October 13, 2017, see from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iran-strategy/>.

^③ Courtney Kube, Alex Johnson, Hallie Jackson and Alexander Smith “U. S. Launches Missiles at Syrian Base over Chemical Weapons Attack”, April 7, 2017, see from <https://www.nbcnews.com/news/us-news/u-s-launches-missiles-syrian-base-after-chemical-weapons-attack-n743636>.

美国的政策反复激发了伊朗民众对经济的恐慌和对政府的不满,这种弥漫于伊朗整个社会的挫败感和压抑氛围对伊朗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第一,汇率崩盘。从选战到上台,特朗普的每次反伊言论都会诱发伊朗国内的恐慌,特朗普的数次废约表态更导致伊朗汇率暴跌。伊朗汇率从核协定签署时的1美元兑换3.5万里亚尔暴跌到废约时的6.5万里亚尔,跌幅接近50%。里亚尔的暴跌迫使伊朗实行外汇管制,货币兑换所被关闭,国际结算弃用美元改用欧元。^①货币崩盘将是伊朗面临的最棘手的难题。

第二,民心浮动。从2017年年底开始,伊朗罕见地爆发了民众示威游行,表达对政府在民生和外交问题上的不满,呼吁伊朗将主要精力和财力放在改善民生上,而不是在军事上支持叙利亚和黎巴嫩。在示威游行过程中,特朗普等通过发表声明或推文声援伊朗示威民众,鼓励民众争取自由,反抗伊朗政府。其目的就是以压促变,利用严厉的制裁手段恶化民众的生活,从而将伊朗民众推到政府的对立面。^②

第三,经济遭受巨大考验。特朗普的顶格制裁范围广,涉及石油出口、贵金属和外汇交易、汽车工业、伊朗的航运和港口运行等多个行业和领域,制裁主体也包括本国和他国与伊朗从事交易的公司。^③道达尔、马士基、西门子、标致、丹佛泵业、印度信任工业公司、哈尼维尔国际、通用电气、波音公司、卢克石油等数十家公司慑于美国制裁确定要离开伊朗。^④制裁理由也从核问题扩大到其他议题,如伊朗网络空间中心、伊朗央行因涉嫌网站监控、革命卫队转账而受到制裁。制裁范围的扩大和新一轮的企业退出将对伊朗民生造成更大的伤害。

四、中东格局再平衡的未来

(一) 伊朗困局与“白衣骑士”的缺失

时隔八年,沙特和以色列迎来极度反伊的特朗普政府,美沙以三国的共同目标就是铲除伊朗,“三打一”的局面将愈演愈烈。对伊朗困局和伊沙对峙的悲观还在于斡旋力量的缺失或难以作为。在伊朗与美沙以对峙中,俄罗斯、中国和英国、法国、德国难以胜任斡旋者的角色,难以在废

约、制裁、冲突降级上发挥重要作用。在废约问题上,当前没有任何国家能把特朗普从弃约的立场上拉回来。核协定的另外五方承诺,只要伊朗遵守核协定规定的义务并和平利用核能,他们将继续维持协定,不跟随美国同步退出,这是对伊朗的最大支持,也是伊朗绝望中的希望。但是,美国的退出让核协定名存实亡,伊朗永远得不到所预期的制裁解除和美伊关系和解。

在制裁问题上,伊朗期望中国和欧盟能够扛住美国的压力,并留出了三个月窗口期同欧盟磋商。^⑤但是,中欧极有可能让伊朗失望,毕竟美国对中欧的重要性远远大于伊朗,国家实力的不对等注定中欧不会为伊朗挺身。而且美国对中兴通讯、德银集团的重罚是在敲山震虎,警戒中欧企业不得违规。尽管中国和欧盟对美国援引国内法制裁他国企业的做法不满,但“不豁免不投资”更可能成为中欧对伊投资的基本准则。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的退出就是例证。也许中欧唯一能做的就是非石油行业上同美国理论,抗议美国对伊朗汽车等行业的制裁。但即便美国作出让步,也只会让伊朗事态不会变得更坏,在国内投资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不断萎缩的外部投资将使伊朗遭遇更加严峻的困境。

在冲突降级上,唯一可能有所作为的就是俄罗斯。俄罗斯对伊朗和叙利亚巴沙尔政府的支持

^① Bryan Borzykowski “Iran’s Economy May Be Headed for a Death Spiral Now That Trump Nixed the Nuclear Deal”, May 10, 2018, see from <https://www.cnbc.com/2018/05/10/irans-economy-may-begin-death-spiral-with-trump-ending-nuclear-deal.html>.

^② Ahmad Sadri “Why Did Protests Erupt in Iran?”, January 3, 2018, see from <https://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protests-erupt-iran-180101142214891.html>.

^③ “Highest Level of Sanctions on Iran: What It Means for Tehran and Others”, May 8, 2018, see from <https://www.rt.com/usa/426200-iran-sanctions-reimposed-details/>.

^④ Ellen R. Wald “10 Companies Leaving Iran as Trump’s Sanctions Close in”, June 6, 2018, see from <https://www.forbes.com/sites/ellenwald/2018/06/06/10-companies-leaving-iran-as-trumps-sanctions-close-in/>.

^⑤ 伊朗期望留在核协定中的欧盟在双边经贸、伊朗石油出口、油款回收、金融解冻、对伊投资上作出可信的承诺。参见“EU Takes Step to Protect Iran Nuclear Deal”, June 7, 2018, see from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8/06/eu-takes-step-protect-iran-nuclear-deal-180606135159424.html>.

能够暂时起到平衡作用。以俄土伊外长会晤机制为代表,俄罗斯在美国、沙特之外谋求探讨叙利亚和平进程,但在战场上难以取胜将让俄罗斯、伊朗和巴沙尔政府难以取得和谈的主导权。同时,除了可能向伊朗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等先进武器之外,俄罗斯在经济上不可能给伊朗以更多帮助。更致命的是,俄罗斯介入叙利亚等中东问题是战术性的,更多是为了借叙利亚之力解克里米亚之围。只要美以沙开出的条件足够优厚,俄罗斯可能会为更大利益出卖伊朗和巴沙尔政府,而且如果美以执意打击伊朗和巴沙尔政府,俄罗斯也难以阻拦。所以,俄罗斯难以充当缓解伊沙对峙困局的“白衣骑士”。

(二) 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与伊朗困局

那么,伊朗困局如何解除呢?在笔者看来,如果发生以下“黑天鹅事件”,或许会改变当前美以沙三角对伊朗的打压态势。

一是特朗普遭弹劾下台。美国国内的反特朗普阵营从未停止对特朗普的弹劾指控,他的废约、迁馆、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开除蒂勒森等行为也备受指责,奥巴马更是指责特朗普的废约将置美国于两难选择:要么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要么发动对伊战争。^①但即使特朗普被弹劾,新政府对伊朗至多回归到“接触+遏制”的政策上来,仍将利用“阿马德项目”、导弹计划、地区干涉等议题向伊朗施压。这更像是融合了奥巴马主义与蓬佩奥的“12条基本要求”的政策组合。

二是沙特出现政权改变。当前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期望通过推动“沙特愿景 2030”、伊斯兰温和化、王室反腐等来改造沙特。但是,“沙特愿景 2030”中发展娱乐产业、旅游业、创建超级城市、武器国产化等举措在实施中存在前期投入巨大、回收周期长、利润率低、科技人员短缺等问题,经济上依赖石油的状况也难以改变;王室反腐也可能打破沙特长期以来的族系间平衡和财权分肥准则。伊斯兰温和化、容许妇女驾车、开放娱乐设施等自由化政策会牺牲沙特的瓦哈比阶层的权益。因此,王储穆罕默德的改革更可能因挑战空前而夭折,甚至不排除沙特因步伐迈得过大而出现政权改变的可能。

倘若沙特真发生了政变,可能会组建由王室其他成员、瓦哈比教士、激进伊斯兰人士接任的不

同类型的政府。这三类群体的共性是都难以接受伊朗的伊斯兰话语,如果是王室其他成员或瓦哈比掌权,即便不跟美国合作,他们也不会改变同伊朗殊死竞争的局面;如果发生概率极低的激进伊斯兰人士掌权,那么剧变后的沙特极有可能同时反对沙特王室、瓦哈比、美国和伊朗。这将是类似 1979 年伊斯兰革命的中东剧变。如果这种极小概率的事件发生,倒有可能刺激美国选择同伊朗合作反对沙特的激进政府,进而改变伊沙对峙和美以沙三方打击伊朗的状况。如果上述两个“黑天鹅事件”同时发生,那么“三打一”的局面则可能会发生改变。

(三) 权力转移与特朗普版的中东格局再平衡

中东的混乱主要由两大因素导致:一是奥巴马主义导致了美国在中东的失位,沙特、以色列对此不满,域外大国或地区大国也纷纷介入,导致中东地区“群雄并起”。二是脆弱国家的内战和恐怖主义泛滥造成的地区影响。因此,美国要恢复中东霸权就必须解决域外大国介入、结盟重构、恐怖主义、脆弱国家重建、核扩散和地区混乱等诸多问题,打击敌人、整固同盟、民主改造、地区治理就构成了特朗普“四部曲式”的任务序列。

在特朗普看来,伊朗集支持恐怖主义、核扩散、地区干涉、威胁美国盟友等罪责于一身,打击伊朗由此成为特朗普政府解决中东问题的钥匙。以压促变和借叙利亚发难成为美国打击伊朗的主要措施。打击伊朗同时还需要团结盟友,由于埃及、土耳其难以倚重,沙特和以色列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地区依托。但拉拢盟友需要美国付出成本,这也是迁馆、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安全义务再确认的内在逻辑。

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改造目前主要体现在对伊朗的政策上,美国对伊朗的改变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蓬佩奥的“行为改变”(Behavior Change)路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2018 年 5 月在美国传统基金会详细阐述了要求伊朗作出改变的“12 条基本要求”,称如果伊朗按照要求作出改变,美国将

^① Eli Watkins “Obama: Leaving Iran Deal ‘Misguided’”, May 8, 2018, see from <https://edition.cnn.com/2018/05/08/politics/barack-obama-iran-deal-trump/index.html>.

恢复同伊朗的正常经贸和外交关系。^①二是博尔顿的“政权改变”(Regime Change)路径。博尔顿认为,伊朗发展核武器、支持恐怖主义、干涉地区事务、压制国内民主都源于伊朗政权的非民主性,改变伊朗政权才是治本之道,因此,先制裁后打击的“利比亚模式”是美国对伊朗的主要政策。^②这两条路径实际上互为表里,相互促进,更像是美国对付伊朗的“A计划”和“B计划”。

同样意味深长的是,政权改变既可以针对伊朗,也可以针对沙特等海合会国家。除了以色列,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均未实现所谓的“民主化”,这一直是美国联盟体系的内在缺陷,尤其当美国在东北亚、东南亚等地区的盟友实现了“民主化”后,这一隐患日益明显。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大中东民主计划”(Greater Middle East Initiative)部分也是出于上述考量。倘若伊朗在美沙以三方力量联合打击下发生了政权改变,那么对沙特等国的政权改造很有可能将被提上议程。尽管美国对沙特等国可能更多采取双边磋商、外交施压等柔性措施,但政治民主化、社会自由化、宗教温和化将成为沙特等海合会国家政权转变的主要目标和方向。

美国一贯排斥域外大国介入中东,俄罗斯却通过支持伊朗和介入叙利亚内战插手中东事务。但随着时间推移和美沙以三国联手,叙利亚巴沙尔政权面临的国内压力将陡增,伊朗的命运也将

因制裁和战争而变得更难预测。一旦叙利亚、伊朗出现状况,俄罗斯的中东战略将彻底崩盘,中东的安全格局又将会重新回到美国控制的轨道上。

解决中东地区的混乱局面将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要内容,帮助叙利亚和也门等脆弱国家进行战后重建、解决巴勒斯坦建国、创建中东无核区等问题将被提上日程。中东地区的治理仍将是美国主导下的治理,议程设置和过程管理都将由美国负责,中国、欧盟甚至俄罗斯或许只能以域外大国身份被邀请参与中东治理,帮助中东从混乱走向稳定。这将是特朗普主政下美国期望的中东权力结构再平衡。

[作者单位]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

责任编辑:文慈

① 这 12 条要求主要包括:放弃核计划、停止支持恐怖组织、撤出在叙伊军、停止支持阿富汗的基地组织等,参见 Mike Pompeo, “After the Deal: A New Iran Strategy”, May 21, 2018, see from <https://www.heritage.org/defense/event/after-the-deal-new-iran-strategy>。

② Daniel Larison “Bolton’s Push for Regime Change in Iran”, May 14, 2018, see from <http://www.theamericanconservative.com/larison/boltons-push-for-regime-change-in-iran/>。